

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

杨天宏

袁世凯是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中心位置上作了一番充分表演的角色。这位凭借强大实力和卑劣手腕而跻身高位的新、旧时代的混血儿，在全面继承曾、李衣钵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曾国藩集团与清廷的矛盾。然而，由于袁氏与曾、李辈“起家的资格不同”^①，也由于时代的差异，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在性质和表现方式上都有了变化。曾国藩等人与清廷固然有难解难分的利益冲突，但客观上他们却辅佐了清室，成为清朝皇帝赐予殊荣的一代“功臣”。而袁世凯则最终毁掉了清廷维持了267年的一统江山，成为清朝遗老遗少们切齿痛恨、莫不以为该杀的“乱臣贼子”。可以说，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是曾国藩集团与清廷矛盾的升级，它不时在晚清政坛上掀起一阵阵轩然大波，对清末乃至民初的政局都发生了直接影响。这样一个极为重要却又缺乏专门研究的课题，自然引发了笔者的写作兴趣。

一

从1881年5月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开始其政治生涯起，到1901年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袁世凯实力的膨胀时期。这期间，袁世凯首先以镇压朝鲜“壬午兵变”崭露头角；继而以练兵小站为日后势力的扩展奠定了基础；接着以出卖戊戌变法而扶摇直上；最后以绞杀义和团运动而位极人臣。总的说来，庚辛以前，袁世凯与清廷的关系表现为和谐一致。两者之间也不无矛盾磨擦，但由于李鸿章的存在，小巫大巫，彰较之下，这一矛盾显得还不突出。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死，临终口授遗疏保荐袁世凯继任直督，内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之语。西太后逼于内外压力，乃依议令袁世凯署理直督，兼摄北洋，半年后改为实授。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从此趋于表面化、尖锐化。具体言之，两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大事件上：

1. 练兵处之设置。1903年底，清廷颁上谕曰：“前因各直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迭经降旨，飭下各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划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着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着派充会办练兵大臣，并着铁良襄同办理。”^②练兵处由是成立。练兵处的设置，本出于袁世凯的建议。1903年春，袁氏便上奏朝廷，建议设立这一机构，同年冬秋之际，袁氏又两次入京觐见，面陈主张。袁世凯之意，盖欲以此一手把揽练兵处，使全国新军“整齐化一”，置于自己麾

下，以便“操纵指麾无不如志”。而清廷则另有他的如意算计。其时袁世凯权倾上下，举国瞩目，清廷当然不会听之任之。清廷之所以同意设置练兵处，是企图在新政的名义下，统一军权，将地方督抚的兵权收归中央，“其重点很明显的在北洋所练新军收回中央”^③。关于这一层，铁良的谋士廂黄旗士官生良弼曾露骨地表白：“我们训练军队，须打破北洋武备势力，应当找士官作班底，才能乱得过他。”^④所以练兵处一成立，就调各省士官如吴禄贞、哈汉章、易迺谦、沈尚濂等数十人来京，供职练兵处，担负草拟各项编制饷章及有关教育训练并国防计划等军政要务，企图将练兵处据为士官派的大本营。但是，事与愿违，在这次权力角逐中败北的并不是袁世凯，而是清廷。因为庆亲王奕劻“分尊事见，素不典兵”，名为总理练兵大臣，实际形同虚设。加之他贪财好色，袁世凯乃投其所好，以重金赚其欢心，以女色博其动容，使之非但不能承朝廷旨意排挤袁世凯，反而成为袁世凯的傀儡。至于襄办大臣铁良，虽曾参与过京旗训练，但其才具资望尚浅，不能放手活动。于是袁得以义办名义，独揽练兵处大权，在权力天平的自己一方，又加上了一尊砝码。对此，清廷当然不会甘心，所以不久就发生了御使王乃徵奏参袁世凯一事，该御使指出：练兵处“大权在握者，固惟独袁世凯耳”。袁以所练之军作警卫之用，“是其爪牙布于肘腋也”；荐举杨士琦为参议、陈世昌为阁学，“是其腹心置于朝列也”；托庆亲王保荐那桐入值外部、荣庆入军机，“是其党援置于枢要也”。总之，袁世凯之心，是“欲举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摄”^⑤。王乃徵一纸奏折，当不能撼动袁世凯，但却给人们留下了袁世凯与清廷矛盾斗争的可贵记录，这一矛盾一日不解决，遇到适当的条件又会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

2. 议设责任内阁。1906年秋，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回国，主张立宪。袁世凯受召进京，在海淀润园参与讨论改革官制。他指使孙宝琦、杨士琦等，提出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的方案，遭到载泽、铁良等人的坚决反对。袁世凯亦毫不退让，据理力争。载泽等舌战不敌，几致动武。据袁世凯与其兄世勋函云：“本月初六奉诏入京，在政务处共议立宪。弟主张立宪必先改组责任内阁，设立总理，举办选举，分建上下议院，则君主端拱于上，可不劳而治。不料醇王大起反对，不辨是非，出口谩骂。弟云：‘此乃君主立宪国之法制，非余信口妄议也。’……醇王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射放。幸其邸中长史深恐肇祸，紧随其后，见其袖出手枪，即夺去云。就此罢议而散，弟即匆匆反津。”^⑥袁世凯出京后，由西太后拍板定下“新官制”，否定了袁世凯以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的建议。更重要的是，“新官制”宣布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并入，铁良为陆军部尚书，毓朗和廕昌为侍郎。军权由此“集于中央”，满人由此重掌军权。此外，邮传部的增设，亦削弱了袁世凯的财权，使之不能继续督办电政、山海关内外铁路及津镇铁路路政。对此，袁世凯极为恼怒，百般运筹，不得妙计。他曾派心腹杨士琦入京运动，希图转圜，但未成功。按照“新官制”，陆军部既已成立，北洋所练新军，都应统归该部管辖。无可奈何之下，袁世凯只好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同年11月18日连递两道奏折，忍痛割爱，声称“为大局计”，“臣兼差八项拟请旨一并开去”，一、三、五、六各镇新军亦交“陆军部直接管辖”。但他却以“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⑦为借口，要求将防区在直隶境内的二、四两镇仍留他“统辖督练”。清廷不敢过于激怒袁，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不久又生一计，明升暗降，调袁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企图使之失去对北洋六镇的控制。对此，袁世凯心里十分明白，但却隐忍不发，他在等待时机，以图转败为胜，扭转眼下受制于人的局面。

3. 丁未政潮。庆亲王奕劻领袖军机之后，袁世凯深与结纳，相倚为重。西太后对之又起戒心。与奕劻同值枢垣的瞿鸿禨揣测西太后旨意，对北洋力主裁抑。会四川总督岑春煊补邮传部尚书，屡言奕劻贪黷误国，请太后将其罢黜，于是，瞿、岑相合。这对庆、袁的地位构成严重威胁，二人乃力谋排出异己之道。政潮由是而起，时间是在1907年4月（光绪33年丁未3月）。当时，舆论方为徐世昌督东三省，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巡抚奉、吉、黑而大哗，御使赵启霖又严劾段芝贵献天津歌妓杨翠喜与载振并借商人王竹林十万金贿奕劻一案。赵启霖特别指出，段芝贵“无功无纪，无才可录”，倒不足为虑，关键在于奕劻之流，“尤可谓无心肝”，非示儆惩不可。疏入，西太后为之震怒，立即撤去段芝贵的布政使御，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并派载沣等人严加查办。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奕劻、袁世凯的劣迹眼看要暴露，二人大震，以为非去掉瞿、岑不可。然而，“瞿岑眷隆，动摇匪易”。奕、袁乃立即派人将杨翠喜送回天津，卖与他人作为“使女”，致使载沣等人查无实据。奕、袁在度过参案危机之后，便危言耸听，造言瞿、岑暗通报馆，谋翻戊戌旧案，请太后归政。案成之前，瞿、岑曾与康有为、梁启超款曲，瞿于辛丑年犹力请解除党禁，宥康、梁之罪。至是，京、沪及海外报纸纷纷贬斥奕劻，所言与瞿、岑如出一口，奕劻乃持以耸动太后。适逢此时瞿鸿禨门人汪康年将瞿密告他的宫廷内幕向报界披露，太后遂信瞿、岑确有私通报馆事。事情出现转机，奕、袁又趁热打铁，将蔡乃煌伪造的岑春煊与康有为“合影”的“若两人聚首密有所商”^⑧的照片密呈太后。并指使恽毓鼎奏参岑春煊等“暗结康有为，谋为不轨”。丁未五月，朝廷终以恽毓鼎之参劾将瞿“开缺回籍，以示薄惩”。七月，岑在改任两广总督三月后，亦落得与瞿同样的结局。大波轩然的政潮终告结束。这次政潮袁世凯等人以耍阴谋弄权术大获全胜，但并未解决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所以过不多久，新的矛盾冲突又发生了。

4. 袁世凯开缺回籍。1908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在两天内先后晏驾。太后留下懿旨，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大统，载沣授为摄政王，“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定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⑨载沣摄政，使袁世凯顿时“不安于位”，因为载沣是光绪的弟弟，对袁世凯愤疾已久。当时，举国汹汹，说光绪之死，乃袁世凯见太后病笃，惧其驾崩后光绪修戊戌旧怨，特贿通李莲英先一日将光绪毒死。康有为等人也在海外鼓噪。康氏还为此上书摄政王，历数袁世凯揽权纳贿，植党营私，欺君罔上，钳制人民之种种罪状，要摄政王将袁世凯“肆诸东市”，以“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⑩。这一切，使得袁终日惶惶，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大祸的降临。然而，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清廷并未对袁采取极端措施，而是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任职”为词，令其开缺回籍“养病”^⑪。此事之内幕，穆瀛（铁良子）有详细记载：“项城放归事，闻诸吾父云，隆裕召军机领班独对，摄政在侧，庆邸入，后出‘先帝手敕办袁世凯’。庆伏地无言，后怒甚，问：‘汝何意？’庆回奏请‘召汉大臣议’，并陈‘张之洞在值未退’。后即斥退庆，召张入，示以此旨，张回奏大意：‘主幼时危，未可遽戮重臣动摇社稷，可否罢斥驱逐出京？’后默许。遂有回籍养病之谕。”^⑫张之洞的幕僚许同莘亦说，当载沣以杀袁询请张之洞时，张“反复开陈”，谓“此端一开，为患不细，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载沣无可如何，只得如其所议^⑬。许同莘之说与穆瀛所言略同，可见袁世凯幸免于难，张之洞实与有力焉。袁在谢过“世叔成全”之恩后，即日赴津，不久便迁到河南彰德，开始了为

期三年“蓑笠垂钓”的“隐居”生活。袁世凯在彰德之所为，论著颇丰，不必再事饶舌。这里仅录袁世凯《自题渔舟写真》诗一首，以窥其心境。诗云：“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年苦未酬。野老胸中负甲兵，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瓠。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⑭诗虽写得蹩脚，却也道尽了作者身虽居于山水之间，但不甘寂寞沉沦的心境，而辛亥年再度出山后逼宫剧的导演，似乎也可以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寻得几分解释了。

二

辛亥革命之前，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已略述于前。由于袁世凯一生言行多变，翻云覆雨，出尔反尔，人们不免为袁氏与清廷矛盾斗争的性质深感困惑。多数学者在寻不到切近事理的解释的情况下，便率尔以“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倾轧”来简单定性，就象过去人们表象地认识曾国藩集团与清廷的矛盾所得出的结论一样。然而，用简单的结论来说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未免有些力不胜任。应当看到，晚清社会是一个动荡不宁，阶级分化激剧的社会。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便逐步分化出一批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长期发展演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最终形成。在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本世纪的头十年是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在此阶段中，由于清政府实施“新政”，官僚资本得以激剧膨胀。1894年，民用企业中的官僚资本共计为2,796.6万银元，到1913年则增长为14,887.5万银元，增长率高达530%^⑮。象盛宣怀、周学熙、张謇、张謇、许鼎霖、沈云沛、王丹揆、严信厚、严子均、孙多森等人，既做官吏，又经商办厂，一身二任，难辨其职。盛宣怀在辛亥革命前对近代企业的私人投资便多达一千万元左右^⑯。其他官僚在投资近代企业上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难怪当时便有人指出：中国有一种“外国所不能见之资本家，盖即官吏是也。东西诸国，官吏而富裕者，未始无之，……惟中国之号为大资本家者，则大商人、大地主，尚不如官吏之多。”^⑰很明显，辛亥前十余年间，官僚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在政治经济上具有独特地位的阶级已经处于形成之中。而袁世凯则不仅是这个形成中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员，而且是这个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代表。我们不妨从经济、政治两个方面对此作一番探讨。

从经济上看，袁世凯虽然在彰德、汲县和辉县拥有数万亩田产，但在他那数额巨大的价值“逾两千万”^⑱的财产中，其地产的份额并不是主要的。袁世凯自任直隶总督始，便大力经营路矿企业及金融事业。他除了巧取豪夺，把盛宣怀经营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的经营权以及关内外铁路、津镇铁路等铁路的督办权据为己有外，还派周学熙等人创办了银元局、铜元局、天津银行、北京自来水公司以及著名的滦州煤矿公司和“执我国水泥界之牛耳”^⑲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这些新创办的企事业，作为北洋集团的利藪，虽非袁世凯一人所有，但其中也有他的大量投资，他和他的儿子袁克定都是这些企事业的大股东，袁克定甚至还自任开滦矿务总局的董事长。

从政治上看，袁世凯也有较明显的官僚资产阶级属性。这在日俄战争之后尤为突出。我们知道，日俄战争的结果，“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当时的有识之士，都认为这不是日俄之战，而是“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日本以立宪胜而俄国以专制败，这无

疑对中国是一次强烈的刺激。从此，“立宪之议，主者渐多”^②。袁世凯就是最早主张实施宪政的官吏之一。早在1905年7月，袁世凯就曾奏请朝廷简派大员，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张本。次年8月，袁世凯再次上奏朝廷说，作为立宪的必要准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以为上议院之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以为地方自治之基础。逮及朝廷派王大臣等筹议立宪事宜，袁世凯等人更是慷慨陈词，据理力争，致使诸王大臣的意见趋于相同，遂有1906年9月1日宣示预备立宪的上谕颁行天下。预备立宪上谕公布后，当时著名的立宪派人士张謇写信称赞袁世凯说：“自七月十三日（旧历）朝廷宣布立宪之诏，流闻海内，公之功烈，昭然如揭日月而行。而十三日以前，与十三日以后，公之苦心毅力，如水之归壑，万折而必东。下走独心喻之，亿万年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繫公是赖。”^③甚至当时有人认为：“此次宣布立宪，当以泽公等为首功，而庆王袁制军实左右之，洵然。吾知他日宪政实行，则开幕元勋之称，如日人之所以赞美伊藤博文者，固将舍是莫属矣。”^④

如果说，张謇等人所言，溢美过甚，而上列袁世凯本人的言论，亦不能充分表明其政治主张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就袁世凯1907年7月28日的一道奏折再作一番分析。在这道奏折里，袁世凯针对朝廷有令不行，故意延宕的情况，催促朝廷赶紧实施立宪并陈十事：1.昭大信（皇帝亲诣太庙，昭告立宪）；2.举人才；3.振国势；4.融满汉；5.行赏罚；6.明党派；7.建政府（采内阁会议制度）；8.中央设资政院，省设咨政局，州县设议事会；9.办地方自治；10.实行普及教育^⑤。从袁世凯陈各条可知，他对君主立宪制度的理解虽不深刻，但也并不浅薄。其主张的侧重点，并不象实施立宪骗局的清廷枢要那样在于强化君权，而是企图通过组内阁、设总理、办选举、建议院来安邦治国。皇帝虽然继续存在，但只是“端拱而上”，有名无实。这种认识，不用说是大体把握住了立宪政治之真谛的。

有学者认为，袁世凯主张立宪，究其心迹，不过是在搞政治投机，因而不能从主张立宪来判断其政治立场与阶级归属。这种意见也未见公允。应当承认，袁世凯对立宪政治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在此过程结束前，他对宪政的态度是“依违持两可”的^⑥。1904年7月，当张謇写信要他体察世界大势，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的重臣伊藤、板垣等人，主持立宪，“成尊主庇民之大绩”时，袁仍复之以“尚须缓以俟时”^⑦六个字。但是这一过程并未持续多久。1905年7月以后，袁世凯便开始参与立宪政治的鼓吹与实施。而当是之时，君臣上下，持立宪之议者尚为数寥寥。对于立宪的主张，“顽固诸臣，百端阻挠，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或以立宪有妨君主大权为说，或以立宪利汉不利满为言，肆其簧鼓，淆乱群听”，就连载泽、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回国后虚伪地主张“立宪”，亦“地处孤立，几有不能自克之势”^⑧。在如此氛围之中，如果袁世凯果真是想投机，那他为什么不投机顽固守旧而偏偏要投机立宪呢？一般说来，搞政治投机的人总是十分看重个人利益之得失的，获取利益应该是一切投机者的共同动机。但是，当袁世凯开始鼓吹立宪时，立宪并不时髦，立宪运动的前景也很难逆料，如果袁世凯果真完全是在投机，岂不是太冒险了吗？退一步说，即便袁世凯是投机立宪，也不能从根本上否认他所具有的形成中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属性。投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政治道德问题，而不全然是政治立场问题，一个人在政治上作出弃彼取兹的选择，恐怕不能说与其阶级归属、政治态度无关。因此我认为，袁世凯投身立宪运动，是由其形成中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属性决定的。官僚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的基本秉性同时又拖着一根封建尾巴的阶级。而形成中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封建尾巴就更粗更长，它是一

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而袁世凯正是这个阶级的代表。国外一些学者鉴于袁政治举止无常，依违两可，无以名之，而称之为“怪杰”。其实，用形成中的官僚资产阶级来为其定性，就会不诧之为“怪”了。因为他具有资产阶级的某些属性，他才会对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制度发生兴趣，并为之奔走呼号；但是，由于他又有一根巨大的封建尾巴，所以，当他解决了与封建的清朝廷的矛盾之后，又随时可能重温封建的旧梦。这样解释，恐怕比简单地斥之以“投机”，更符合袁世凯这个政治动物的实际。

谈到袁世凯的阶级属性，似乎不应该忽略了列宁研究袁世凯时所得出的结论。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列宁曾明确指出，袁世凯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活动家”，是“刚刚从自由君主派变成自由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④。列宁对袁世凯的定性与我们所作出的“形成中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定性虽然有某种程度的差异，但同样道出了袁世凯所具有的资产阶级属性，对我们研究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无疑是有启迪作用的。

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除了具有形成中的官僚资产阶级与封建顽固派斗争的性质外，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满汉民族的矛盾。满、汉矛盾由来已久，但在近代历史上，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这个问题并不十分突出。中日战后，满清政权的腐朽暴露无遗，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族主义相号召，鼓动革命排满，遂使“满汉之见，深入人心”^⑤。这种状况又反过来刺激了满清贵族，使之增长了与汉人的敌对情绪，使得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角逐打上了深刻的满汉民族之争的烙印。练兵处的设置，表面上是为了“培植铁良以代替袁世凯”，“实际上是思削除汉人庞大的兵权”^⑥。这一招失败后，清廷又借改革官制为名，任命满族亲贵铁良为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迫使袁世凯交出大部军权。由此，满族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⑦。丁未政潮表面上是庆、袁与瞿、岑之争，实际上，庆王不过是袁的傀儡，瞿、岑不过是太后的爪牙，这场政潮不过是前两次斗争的演化，仍然带有强烈的满、汉民族矛盾的色彩。章太炎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目下满洲政府正有中央集权的意思，要把财政兵权，都归几个满员掌握，外省督抚不过留个空名。”^⑧章氏的论述，充分揭示了这一系列斗争的奥秘。

当然，也应当看到，在与清廷的矛盾斗争中，袁世凯常常拉拢某些满族亲贵以为奥援。最初他倚荣禄为靠山，并千方百计争取西太后的宠信。荣禄死后，“庆亲王之倚信之反十倍于荣禄者”，而且与袁世凯作对的也不尽是满人，汉人也大有人在。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上述一系列斗争并非导源于满汉畛域。其实，利用满族亲贵中的某些人只是袁世凯与清廷斗争时玩弄的伎俩，而这种伎俩，不过是曾国藩、胡林翼与清廷矛盾斗争中自卫手段的翻版^⑨。曾国藩练湘军尝力荐满将塔齐布，胡林翼巡抚湖北曾设法交欢满总督官文。然而，曾、胡等人与满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交谊，“彼此不过敷衍而已”，“其心亦止容身保位”^⑩。袁世凯与荣禄、奕劻的关系，显然带有同样的性质。其与奕劻的关系以金钱来维系，即此说明。

总之，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既具有形成中的官僚资产阶级与封建顽固势力斗争的性质，又带有浓烈的满、汉民族矛盾的色彩。这一定性，源于事实，与经典作家的结论又不甚相悖，大概能够成立吧。

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对清末民初政局发生了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复杂性导源于双方矛盾的性质，导源于袁世凯本人形成中的官僚资产阶级双重的政治属性。

作为形成中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员，袁世凯同时具有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两种政治属性，而这两种属性的内涵与外延都具有不确定性，它们都是变量而非常量，由于某种特定利益或条件的驱使，有时候资产阶级的属性更突出些，有时候封建主义的质点又更鲜明些。列宁认为袁世凯“最善于变节”^④，无疑抓住了袁世凯的本质特征。而袁世凯与清廷矛盾的影响便恰恰产生于这个“变”字。

辛亥前几年的立宪运动中，由于清廷意欲攘夺袁世凯的权力，袁世凯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资产阶级政治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纷纷将他引为同调，企图借重其军政实力，张大立宪运动的声势。双方一拍即合。从此，袁世凯“以在朝大官僚的身份和在野的立宪派一唱一合，遥相呼应。国内立宪派视他为宪政运动的中坚”^⑤。袁世凯与立宪派的结合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方面，它实实在在地壮大了立宪派的力量，为武昌起义后地方政权大多落到立宪派手里预设了条件。另一方面，它进一步激化了袁世凯本人与清廷的矛盾。加上满汉畛域日渐加深等因素，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致使清朝统治阶级中不同集团之间的倾轧公开化、白热化，使1905年以后的中国政局，呈现出极度动荡不宁的局面，使封建的清王朝因此而陷入空前的统治危机，这就大大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社会政治科学早已向人们揭示，革命要获成功至少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产生了革命的要求；二是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近代以还，清政府对人民残酷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已经铸成了革命成功的第一个条件，而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则无疑造就了清朝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政治形势，没有这后一个条件，辛亥革命成功的希望将是渺茫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将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与太平天国反清革命力量作一简单比较。人所共知，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浩大，它延续14年，纵横18省，建立了与清廷对峙的天京政权，拥有一支号称“百万”的庞大军队。这次农民起义的规模，达到了中国历代单纯农民武装起义的顶峰。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与之相较，差距何止倍蓰。武昌起义之前，革命派主要在海外活动，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虽然在运动会党与新军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辛亥以前历次举义留下的仅仅是失败的记录。然而，两次革命的最后结果殊出人们预料之外，太平天国革命以失散而告终而辛亥志士却赢得了推翻满清王朝的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太平天国时期，清朝统治阶级内部营垒尚未崩溃，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集团还可以通过调整内部关系达到暂时一致。而辛亥时期革命的敌人则因前述矛盾闹得分崩离析，自顾无暇。清王朝气数已尽，正如“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一语所揭示的道理一样，清王朝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这一内在因素使然。如果没有这一因素，辛亥革命的结果是难以逆料的。就在武昌起义后，南北议和之时，黄兴曾十分担心袁世凯“象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⑥。黄兴为之不安的事虽然没有发生，

但他这一度量彼己之言，却无疑道破了何以辛亥革命能以弱小军事力量完成反清大业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即袁世凯并没有在决定辛亥革命命运的关键时刻，为清廷效力。

当然，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对辛亥革命亦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袁世凯作为形成中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不仅代表了官僚资产者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及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利益。在袁世凯身上，体现了极为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袁世凯固然最终作出了与清廷分道扬镳的抉择，但他所走的路与辛亥革命志士乃至真正的立宪派人士都有区别。这种区别在他登上临时大总统位置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在彻底解决了与清廷的矛盾之后，袁世凯已经闭上了高喊立宪与“共和”的嘴巴，竖起了他那粗大的封建尾巴，他再一次“变节”了。然而，势单力薄的革命派还时刻回想着当初袁世凯与清廷斗争的难解难分的激烈场面，对袁世凯产生了幻想。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曾明确表示对袁“绝无可疑之余地”^①。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说：

“余与袁总统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故欲治国民，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荐项城，并不谬误。”^②由于有此认识，孙中山甚至致电袁世凯：“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③孙中山哪里知道，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开始做他的皇帝梦了。黄兴对袁世凯虽然心存疑虑，但也对他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武昌起义甫弥一月，他就致函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诚如是，则“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无不拱手听命者”^④。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黄兴以为革命事业大功告成，把精力更多地转移到利用既得的社会地位从事于私人的实业活动，一心在湖南筹办矿务，丧失了对袁世凯复辟倒退的警惕性。

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不仅迷糊了孙、黄等革命党人的政治视觉，也给梁启超等戊戌政变时便与袁结怨的立宪派造成错觉，以为袁世凯老谋深算，虽其心迹千孔百窍，难以捉摸，最终还是自己实施宪政的同路人，于是纷纷释去前嫌，与袁握手言和。梁启超甚至发表演说，谓“乙未（1895年）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人之一也。彼时同人固不知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国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纸，袁公首捐金五百。”^⑤戊戌旧怨至此似乎已经完全烟消云散，而六君子似乎也被宣布死得甚无谓了。至于那些早就与袁世凯勾搭的国内立宪派如张謇之流，更是把君主立宪的政治希望，完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武昌起义不久，他们便明确向袁表示：“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⑥袁世凯到临时政府走马上任后，张謇等人更是急不可耐地想要接受他们视为理想的君主立宪制的赐予。

由于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惑于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都对袁世凯存在幻想，袁世凯颠覆辛亥革命的成果，进而弄权窃国，也就易如反掌了。

注释：

①③④⑫⑳ 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

②⑤⑦⑨⑳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

- ⑥《项城书札择抄》。
- ⑧胡思敬《国闻备乘》卷3，第12页。
- ⑩康有为《上摄政王书》，《康有为政论集》1981年版，上册，第639页。
- ⑪《宣统政纪》卷4，第12页。
- ⑫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4年重庆版，卷10，第228页。
- ⑬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6页。
- ⑭复旦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29-139页。
- ⑮黄逸峰《旧中国的买办阶级》，1982年版，第113页。
- ⑯《中国经济全书》第1辑，第119页。
- ⑰孔丘仲子《徐世昌》上海崇文书局1918年版。
- ⑱颜惠庆《周止庵先生事略》，见周叔嬭《周止庵先生别传》，第六章，《后记》，第205页。
- ⑳㉑㉒《立宪纪闻》，见《东方杂志》第4年临时增刊《宪政初纲》。
- ㉓张謇《为运动立宪致袁直督函》（光绪32年丙午），《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
- ㉔张孝若《立宪运动及咨议局成立》，见《辛亥革命》（四），第159页。
- ㉕张謇《啬翁自订年谱》，1925年版，卷下，第16页。
- ㉖㉗《列宁选集》第2卷 第423-428页。
- ㉘张一鸾《心太平室集》卷8。
- ㉙挥毓鼎《崇陵传信录》。
- ㉚章太炎《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330页。
- ㉛参阅拙著《曾国藩集团与清廷的矛盾》，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 ㉜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五月十八日。
- ㉝李宗一《袁世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4页。
- ㉞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00页。
- ㉟孙中山《致黄兴电》，《孙中山全集》卷2，第450页。
- ㊱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卷2，第484-485页。
- ㊲孙中山《致袁世凯电》，《孙中山全集》卷3，第68页。
- ㊳《黄兴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 ㊴梁启超《饮冰室全集·文集》二十九。
- ㊵张謇《劝告袁内阁速决大计申》，《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4。